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2.3

“观看” Tahrir

Samia Mehrez

ISA论坛在 Buenos Aires

Alberto Bialakowsky
and Alicia Palermo

波兰移民

Ewa Palenga-Möllenbeck

全球社会学辩论

Jeffrey C. Alexander
Paulo Henrique Martins

- > 令人失望的后苏维埃社会学
- > 纽西兰的毛利社会学
- > 后苏维埃的亚美尼亚新贫
- > Current Sociology的历史
- > 日本编辑团队介绍
- > 全球化教室
- > ISA的选举不公
- > 纪念：John Rex和Kurt Jonassohn
- > 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哥伦比亚、土耳其国家、印度、金砖四国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二卷 / 第三期 / 2012.02

GDN



> 主编的话

社会正义与民主化

Buenos Aires对于即将登场的ISA论坛——社会正义与民主化——来说是一个特别适合的地点。如同Alberto Bialakowsky、当地组织委员会会长Alicia Palermo，以及拉美社会学会会长Henrique Martins在本期全球对话中所说的，拉美不仅孕育了追求正义与民主的社会运动，社会学家在这之中也扮演了如英雄般的角色。如此一来，它们有了相当独特的地方社会学，这点我们将在论坛中看到。

“社会正义与民主化”这个主题暨合理又符合历史氛围。Samia Mehrez 的首篇文章就是对于埃及“一月革命”的一周年回顾反思，对该其多元的意义进行讨论。的确，开罗的Tahrir已经引起了长达一年的全球革命浪潮。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在突尼西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展开，并激起了欧洲对于财政紧缩的抗议运动，还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也不该忘记在以色列、智利、俄国的群众抗议。这些或许是国家内部所挑起的愤怒，不过其运动的精神却是全球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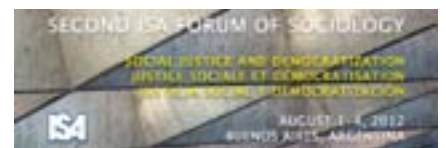
我们并没有太多被剥削者的运动。虽然他们已经加入，可是仍然被逐出。其存在的意义正式因为其相当罕见。这些通常都是学生、或是之前是学生，也就是广义的年轻人所发起的运动，他们的未来被牺牲了，丧失可以应用所学的机会。此外还包括失去土地与水源的农民所发起的运动，在中国、印度、菲律宾、巴西、玻利维亚和其他地方皆可看见。占领运动也反对都市圈地，与那些霸占原本应该是公共领域的警察对抗。

当占领华尔街运动象征性的挑战资本主义时，他们也实际地挑战着社会学。不平等研究不能再如以往限制在99%的人身上，还要更关注1%的那群人。我们不能只看收入，而是还要研究财富以及1%的人如何剥削99%。政治社会学也不仅只能研究选举民主，因为其无力反对社会正义，也对管制金融资本束手无策。占领运动已经以参与民主的方式定义了自己。这点，拉丁美洲是先行者。1990年代的结构经济瓦解导致了十多年的反对运动，例如阿根廷占领工厂和公共场所的运动。这也是为什么Buenos Aires是举办论坛恰当地方的另一个原因。

全球对话每年以13种语言发行5期。读者可以在[Facebook](#)以及[ISA website](#)阅读全文。稿件请寄给Michael Burawoy: burawoy@berkeley.edu。



观看Tarir：埃及1月25日的革命激起了全球抗议浪潮。正值周年时Samia Mehrez思考其在埃及和其他地方的多元的意义。



Buenos Aires的ISA论坛的挑战：在地组织委员会的Alberto Bialakowsky和Alicia Palermo告诉我们他们规划如何办这场全球性的正义与民主的讨论。



波兰移民：苏联的解体产生许多中东欧的新移民，反映了地方发展的不均等。Ewa Palenga-Möllénbeck讨论了德国的波兰移民。



在地国际主义：Jeffrey C. Alexander延续全球社会学的辩论，说明在地与全球如何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sht, Shahvand, Fatemeh Moghaddasi, Saghar Bozorgi, Jalal Karimian.

日本: 西原和久, 芝真里, 塩谷芳也, 姫野宏辅, 高见具広, 池田和弘, 岩馆豊, 福田雄, 三部伦子, 佐藤崇子.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Anna Piekutowska,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Tomasz Piątek, Julia Legat, Mikołaj Niziński,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Patrycja Pendrakowska, Wojtek Perchuć, Adam Mueller.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Elena Nikof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经懋

乌克兰: Svitlana Khutka.

媒体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社会正义与民主化 2

> 跨国转译

“观看” Tahrir
by Samia Mehrez, 埃及 4

Buenos Aires的ISA论坛的挑战
by Alberto L. Bialakowsky and Alicia I. Palermo, 阿根廷 6

波兰移民
by Ewa Palenga-Möllenberg, 德國 8

> 辩论: 不平等世界的社会学

在地国际主义
by Jeffrey C. Alexander, 美國 10

拉丁美洲: 宿命的社群?
by Paulo Henrique Martins, 巴西 12

> 区域

令人失望的后苏维埃社会学
by Victor Vakhshayn, 俄羅斯 14

纽西兰的毛利社会学
by Tracey McIntosh, 紐西蘭 16

后共产亚美尼亚的新贫现象
by Gevorg Poghosyan, 亞美尼亞 17

> 特集

历史一隅: Current Sociology的历史
by Jennifer Platt, UK, and Eloísa Martín, 巴西 18

社会学教学: 全球教室
by Larissa Titarenko, Belarus, and Craig B. Little, 美國 20

ISA的政治: 对国家学会的不平等待遇
by Roberto Cipriani, 義大利 22

编辑介绍: 日本团队 23

> 纪念

John Rex过世, 享年86岁
by Sally Tomlinson and Robert Moore, 英國 24

Kurt Jonassohn, 1920-2011
by Céline Saint-Pierre, 加拿大 25

> 會議

哥伦比亚社会学的承袭与断裂
by Patricia Jaramillo Guerra with Fernando Cubides, 哥倫比亞 26

欧亚的土耳其社会学
by Elena Zdravomyslova, 俄羅斯 28

印度社会学会的60周年大会
by T. K. Oommen, 印度 30

金砖四国的社会阶层
by Tom Dwyer, 巴西 32

> “观看” Tahrir

by Samia Mehrez,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埃及

Samia Mehrez在AUC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文明系任教，是阿拉伯文学的特聘教授，同时也是翻译研究中心的主任。我最近在开罗和她碰过一次面，知道她正准备发表新著作，是一本对于Tahrir革命有着非常精彩叙事的书，相当令人振奋！因此我邀请她为本期的全球对话写了这篇文章。--Michael Burawoy



这篇文章要发表的时候，大概也是Tahrir革命刚满一周不久。发生于去年的1月25日的这场革命运动最后逼迫了总统Mubarak于2月11日下台。这个运动开启了许多可能性，特别是埃及自身，埃及于区域中的角色，以及埃及在全球的位置。这场1月革命带来了丰富的论述资源——在thawra (革命)和inqilab (政变)中不断来回辩证，并且迄今还是对于埃及人所关心的单一事物的命名与框架，抱持着非常反对与抵抗的态度。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

定的：从1月25日和接下来的十八天，Tahrir广场(包括了暴力冲突、示威游行、静坐等)为埃及的历史开启了崭新的一页，也成为了埃及的象征地：代表着持续不断的反对运动浪潮。这股运动浪潮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持续改变着埃及社会。

1月25日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广场上死伤与被逮捕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人很担心它会变成一座“展览馆”，仅仅展示着自己。他们所害怕的，毋宁是如我同事Amr Shalakany所说的“那不过就是一个可以让

在Tahrir广场的大旗帜标示着1月25日革命的周年。上面的人分别是Hussein Tantawi (左)，前总统Hosni Mubarak (中)和前内阁Habib al-Adly。下面写着：“民主”。Mona Abaza摄。



Samira Ibrahim于12月在开罗的一场游行中比出胜利手示，代表女权的伸张，因为她成功的控告军方不当对女囚进行处女检验。

人们观看革命的地方，你来瞧一眼，晃一下，然后就回家了，或是回到地球的另外一边。”没错，人们的确是来Tahrir广场“观看”革命，甚至有些人根本就在家看电视或上网看而已。但是，我要说的是：有过这样的“观看”，观众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共同参与了这座展场、这个“观看”的转变——革命性的转变，形塑了新的历史主体。

在这个脉络下，“展示场”的功用不在于取代政治活动，而是一种革命性动员和激进化的模式。的确，一波接着一波的运动和“展示场”，不论是和平或是暴力的事件，都被大众记录、传播、流通开来，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埃及人因此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空间关系（不论公或私、真实或虚拟），也得到了新的对于身体的拥有权和权力，开始要行使自身的权利，讲出自己的语言（不论是口说或写作）。

Mubarak专政达30年之久，控制着埃及的公、私领域，政府，以及公共文化，其政权在1月底之后也被军事政权再生产着。这个政权是因为紧急法律的强制执行，合法化拘留和刑求，并对言论自由严加审查。不过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大众革命运动的发生。

多个埃及革命展示场的出现

象征着独裁政权的摇摇欲坠，也开启了埃及自由时代的历史性一刻。埃及人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奋力保卫自己的身体、空间、语言的主导权。而这些很有创意的政治社会运动也感染了世界尚其它的国家。这些展示场中，其中一个发生在过年前夕，也是广场历史性的一刻，它把埃及人民整个动员起来。这场革命一直持续着，尽管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以及Mubarak的新党羽：Muslim Brotherhood和Salafis也一起要威胁、削弱人民的运动。的确，有“展示场”，就有由政府 and 军事法院所派出干扰的“反展示场”。

在一开始，埃及革命的展示场利用、激进化、并彻底转变了传统mulid的仪式——对于跨越埃及阶级之全国性的精神人物所庆祝的生日仪式。在过去的一年内，Tahrir成为了mulid仪式的一部份。这样一个仪式性、嘉年华的模式，带来了所谓“Tahrir独立共和国”的诞生。这毫无疑问是个展示场，把上百万的埃及人带到街头来一起参与革命。其中之一——观看广场的最革命性的结果，是在于透过了解到Tahrir（解放）并不只是一个实体的空间而已，而更是集体的状态与意识，而埃及人的基本诉求：ish, Huriya, ‘adala igtima ‘iya（面包，自由，正义）并因此继续

发挥重要性。持续不断上演的暴力事件，以及隐微的暴力恫吓（将运动者殴打、电击、伤残，对女性运动者检查贞操，军事审问，杀害，突袭媒体或NGO，攻击或逮捕外国记者，选举作票，侵犯女性等等），也因此都被社会媒体或私人卫星所传播开来。

持续不断的暴力事件彻底损害了起初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浪漫关系。但越来越多的埃及人知道革命不会只在这里上演，还会在全球各地的其他地方发生，转译着Tahrir展示场的精神：人民要求政府垮台！（al-sha ‘b yurid isqat al-nidham）■

> Buenos Aires论坛的挑战：

用平等的社会学挑战不平等的世界

by Alberto L. Bialakowsky和Alicia I. Palermo, 在地委员会会长和副会长, ISA 论坛, Buenos Aires, 阿根廷, 2012

ISA论坛将于8月1-4日在Buenos Aires举行，准备工作也已经展开。整个过程——从选择在Buenos Aires落脚——代表了全球性的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交换即将在这个城市发生。这或许是近10年内在拉丁美洲所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无疑地，拉丁美洲的知识实力正如其文学传统一样，相当有名，但是在扮演一个集体批判转型的角色上，还有许多努力的空间。这个会议也将会成为拉丁美洲学习与建立内部对话的机会，也让世界北方或南方有机会一起面对社会科学的挑战。

有三点我想要强调。第一，大会主题是“社会正义与民主化”；第二，讨论科学知识生产和社会转型下我们这个学科所扮演的角色；第三，论坛本身的智识结构是一个或许常被忽略、但是却很重要的面向。

关于第一点，将主题与征

稿放在一起通常就要去审视专长和次领域，但是也包括跨领域的问题。复杂度的典范使我们更容易可以找到多元的观点，也允许我们去克服各种二分法，像是巨观和微观，单一学科和跨学科等。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处理各个层次的问题，并从各种角度出发，深化单一领域的知识，并做跨领域的结合。因此，社会正义和民主化将会出现在各个不同的次领域中，也会超出学科界线之外，产生出意义。

社会学的历史充满了对正义和不平等的评价。某些理论的角度倾向保持现状，某些则支持社会转型。将权力摆在社会学中心有助于我们去消弭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易言之，所有的社会学都必须承担各种乌托邦或是生命政治的实践，因为这些是研究的动机所在，并遍布在社会学理论、应用、分析，以及知识的转变之中。

在当代全球化的社会里，系统性危机所带来的痛苦，不断地要求我们要用新的知识去正视不论是在一个社会内部或是跨国社会的不正义。全球人权议题争辩的再次浮现带来了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方面，科学知识进程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上述两者对于社会平等的影响。这两个面向都和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于地球动态的了解有关。任何企图想要控制这两者关系的努力都反映出了实证主义和启蒙的优越感，因此也都遭受到质疑。这样的说法源自于法兰克福学派，而最近则由拉美“批判与去殖民化思想”的作者群所提出。科学进展并不等同于社会正义或民主参与。打个比喻来说，社会的基本构造就是坚持使用奴隶制度，贫穷、种族或族群隔离，性别、大屠杀、生态浩劫等。

所以显而易见的是，民主

化不是只发生在社会的层次，还会出现在社会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甚至是不同的学科之间。不过，生态本位主义、人类本位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霸权思想，也不只有出现在研究之中，它们也都在知识研究建构的过程中可以看见踪影。若参考“从拉美新的依赖而来的激进认识论批判”，会发现Sujata Patel (2010) 这样说道：“如Aníbal Quijano, Enrique Dussel, 和Walter Dignolo都已经阐述过这个立场，认为社会学理论的普遍化是知识的地缘政治之一部分。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去审视现代性及其和社会理论的关系。

换句话说，这不只是在不同学科里面去做研究的问题而已，更重要的是认识论的不对称性和霸权的理论化性格。新理论潮流的对话方式拒绝了根植于现代性典范下的不对称性，认为这些对立可以被克服。这样的经验我们可以用非洲学者的话来证明：“奈及利亚的社会学历经了许多困难的阶段。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我们要做的不只是解释我们在地的社会、找出原因、找出社会结构的冲突点，我们还需要能动性去把这些社会过程都抛弃。为了此一目的，我们需要典范的转移。” (Onyeonoru, 2010: 280)

不论如何，我们相信这样的思考方式都代表着我们真

“近几十年来在拉美最重要的会议”

的是需要新的典范去建立新的“知识生态”(De Sousa Santos, 2010)。在连续危机的这个脉络下，社会学可以提供对于跨国之间的认识有帮助之批判性的研究。不过这不代表我们自己就不需要反省，或是就不期待以全球的角度去讨论事情。

为了反对社会不平等和快速变迁的社会，在解释社会和转变的方面，社会学家有很多任务在身。全球性危机对于社会各个面向的影响一直在增加当中。像是全球北方或南方，我们就可以支持那些奋力挣扎的社会组织提供支持。

如此一来也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ISA论坛准备好去面对这样的挑战了吗？无疑地作为一个特殊的结构，答案是肯定的。的确，论坛作为对话的场所，就是希望激荡大家的思考，深化辩论的内容。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研讨会和场地——我们将会透过创意性的思考对全球的社会分析做出贡献。事实上，这将形成一个批判和反身

性的社群，并产生普遍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集体的、也是公共的。

我们承诺会带来热情友好的氛围。此外，我们也希望在各个场次一个综合性的辩论，邀请研究委员会、工作与主题小组参与。■

References

De Sousa Santos, B. (2010) *Para descolonizar Occidente. Más allá del pensamiento abismal*. Buenos Aires: CLACSO-Prometeo-UBA.

Onyeonoru, I. P. (2010) “Challenges of Doing Sociology in a Globalizing South: Between Indigenization and Emergent Structures” Pp.268-281 in Michael Burawoy, Chang Mau-kuei, and Michelle Fei-yu Hsieh (eds.)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 (Volume 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nd 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atel, S. (2010) “The Imperative and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Reconstructing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in an Unequal World” Pp.48-60 in Michael Burawoy, Chang Mau-kuei, and Michelle Fei-yu Hsieh (eds.)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 (Volume 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nd 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he most significant such meeting in Latin America in decades”

> 波兰移民： 跨国者或是客工

by Ewa Palenga-Möllenbeck,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德国



从1990年代起，移民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从前古典的研究将移民视为是一个一生只会出现一次的事件，并且移民者最终会融入到移民社会中，或是永远返回母国；现在，研究者开始研究跨国迁徙者如何和多个不同的社会保持连带。这个方法发展于北美移民的经验上，不过在欧洲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迁徙模式。例子是Upper Silesia的移民。该地现在是位于波兰，不过在二次战前是德国和波兰的边界。

由于*ius sanguinis* 是德国公民法律的基本原则，该地的居民不论和德国有多少程度的社会连带，一律都具有德国公民身份，并且不用放弃原本的波兰籍。许多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就借着这个法律漏洞到德国找工作。因为在2011年以前，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对波兰人开放的。固然有许多Silesia的居民已经永远定居在德国，不

Upper Silesia和德国的密切关系有着长久的历史因素。在这张一次战后的图片中，Upper Silesia被描绘为在波兰(贫穷女性抱着婴儿)和德国(繁荣的工厂和乡村住宅)之间的拉扯关系。现在许多居民认为被这两个地方牵绊住了。原图保存在英国London的Imperial War Museum。

>>

过还是有数十万人保有波兰的永久拘留权，并通勤到德国工作。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可以拥有比较好的生活水平。

这个个案中的双重国籍者说明了并非只要拥有法律上的特权的人就算是跨国迁徙者。大多数人都是处在移动的生活方式中，但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双脚分别踏在不同国家土地上的跨国者。就像我们观察到有一类移民总是在移动，可是只会和母国保持社会关系。这个事实有点令人惊讶。因为，毕竟他们是有理由成为跨国者的，因为他们会双语或是移民传统等的文化因素、法律身份，以及移民身份相关的工作等等。

可是现实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一方面，那些拥有双重国籍者，不论在德国或在波兰都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这也使得他们成为“融入德国的非移民”。另外一方面，也是

因为波兰的高度安全鼓励他们多移民，但却让他们不想和移民国建立永久连带。因此，结果就有两种，一种是保持两个身份，另外一种就是成为非法移民。后者被迫要融入于德国社会以避免被遣返和逮捕，但是又由于不会德语和不了解德国社会，所以只好高度依赖其各自的移民公司。一位移民公司的主管这样说：“他们知道有人会照顾他，他们只想工作，想赚钱，如此而已。他们只想让自己好像拥有德国护照，赚钱、工作，就这样。”

这里所描述的双重国籍者，其实比较像50年代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德国的波兰客工，反而不是那种聪明到可以在两国分别周游斡旋的移民。不过这种资源丰富的移民在Silesia也看得到，他们会双语，拥有专业技能、文化资本。但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两种移民的呢？答案肯定相当

复杂，我想在这边是没有办法可以详细讨论的。一个可信的因素是“客工生活方式”存在于跨国移民的产业之中，这些产业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给移民，不过也同时让这些人距离移民国越来越远，始终无法融入。 ■

> 在地国际主义

by Jeffrey C. Alexander, Yale University, 美国, 前ISA社会理论研究委员会主席(RC16), 2010 ISA Mattei Dogan Foundation Prize得主。



这里是两张自然风景的美学再现。一张是中国的画作，另一张是美国的。他们都不是所谓的本土创作，可是都兼具了国际和在地的元素与风格。换句话说，艺术从来不是自然的客观再现，如同社会学也不可能客观地再现社会。

Piotr Sztompka和Michael Burawoy之间的这场迟来的辩论相当有意义。两位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理论家，其之间的对话不但重要，且彼此针锋相对，充满矛盾。我想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概念和想法非常新颖出色；相反地，他们之间的矛盾反应了社会科学思想的悠久历史演进。当然，这个议题会持续存在着，我们也必须定期地更新和厘清我们的想法。

社会学向往着理性、普世主义、以及普遍性。然而，虽然说这些理想代表着自然科学的成就，但是这不代表社会科学也非得达到这样的

目标不可。这个道理在一百年前Wilhelm Dilthey就告诉我们的了。社会学就像艺术一样，是一种生命经验的在地反思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就只是完全在地化的思考而已。

重要艺术作品的风格总是被某重美学传统所形塑，而且这个传统可以超越某种地方主义的形式。地方主义则提供了作者表达思考的方式。在中国，这种外部风格来自于所谓的古典传统。在19世纪的西方，正值现代主义兴起时，地方的欧洲画家不断地参考他们口中所谓的现代主义。那些想要创立自己国家最前卫艺术风格的艺术

家，则努力想要连结在地风格和以巴黎为中心的外部国家美学，并且让那些地方性的作品可以持续地留在巴黎这样的大都市内。

社会学也不例外。如同艺术，所有的社会学都是在地的，因为社会学在做的无非就是去理解在特殊时空条件下的某个社会经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皆然。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而这样的差异代表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经验本来就不尽相同，也因此决定了到底什么才是社会学想要知道的。

从不同国家的社会学中我们可以开拓视野，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一个国家最需要被解释的问题、权力斗争、或是文化意义。我们之所以可以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是因为这些作品被翻译成特定一些相对多数人在用的语言，在会议上发表，或是发表成为文章。正是这样跨越地域的翻译，才使得知识的累积得以可能。

然而，将在地的社会学观察转变成特定时空下的经验成果这点上来说，社会学并不会比艺术来得容易达成。地方社会学很难只是地方的，因为地方总是被其它的地方和全球性的因素所影响，像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智识或是宗教等的因素都持续不断地在形塑地方或民族的认同。当然，我们有中国社会学，有台湾社会学，也有韩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它们都各自代表着独特的知识传统，这一点不能否认；可是，它们各自也很

难只是地方性的产物而已。地方社会学的出现其实也包括了全球学术机构的训练，使它们可以从去中心化的角度去关照在地的社会经验。

正是这样的“在地国际主义”使得社会学家采用超越个人、地方机构及情境的判准去评断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若我们说世界上每一位社会学家都有这样理性的期待，并不为过。因为，没有人会因为其同事只是因为其作品可以处理在地的的问题就可以宣称其有效性，更不可能因为同事跟他们是同一国族的人，像是非洲、印度、美国、中国等，就做出如此的宣称。社会学只能是反身性的，否则，其就什么都不是了。

艺术也是如此。19世纪的美国艺术和欧洲潮流完全不相干。其自视甚高却相当狭隘，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就是国家的艺术或是很简单的艺术而已。到了19世纪末，一些比较有抱负的艺术家到欧洲，特别是巴黎，然后在20世纪的前半叶，美国的在地世界主义艺术家生产了许多很承袭自法国的优秀作品。只有在二次战后，美国才拥有自己的艺术传统，因为美国已经成为强国，世界历史围绕着美国而展开。所谓的“纽约派”风格开始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然而，即使纽约是个地理意义上而言的“地方”，可是抽象表现主义很难被视为是美国在地传统的产物。事实上，其代表的是欧洲现代主义的延伸，而在更早之前，这则是批判

性地结合了日本、非洲、前哥伦比亚原住民等的风格传统。

社会学也将会这样发展下去。其实我们很幸运可以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500年来第一次可以有机会挑战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时代。这样的多重现代性也终于可以挑战不仅是军事强权的西方，也可以质疑西方霸权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当这些不论是来自中国、印度、韩国、南非、俄国等的思想家一旦卸下它们理论或方法论的盔甲时，他们将不在仅仅是地方性的思想家了。他们的作品将会是这个长期智识全球化下的产物。

普遍性的社会学并不会来自于地方。不论是社会学或是艺术都没有所谓的纯粹地方的这种东西存在。他们同时不是在地，却也都是在地的。■

> 拉丁美洲： 命运的共同体？

by Paulo Henrique Martins, Federal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 巴西, 拉美社会学会会长

全球化为知识生产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式，藉此得以挑战长期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知分工体系，并且进一步反思现代性的内涵。对于像是Arjun Appadurai等的学者来说，“第三世界”已经不再是北方国家的数据库了，同时，北方也失去了输出知识到南方的特权。在这个意义之下，全球化成为一个特殊的场域，这个复杂的地理过程，跨越国族疆界，同时国族也做为知识生产的单位，让社会学知识的建构得以可能。

让我们想想拉美的这个特殊的例子。知识的全球化对于社会学认识论传统的改变，有着很大的贡献。在1940-1980年之间，也是所谓的第一阶段，批判思想的出现取决于全球化如何以经济或政治依赖的方式被再现。我们在两种主要的思想中可以印



证这一点。第一个是结构主义，其被拉美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所启发。该组织在1948年成立，目的在思考拉美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两位经济学家：阿根廷

的Raúl Prebisch和巴西的Celso Furtado。他们认为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当全球贸易制度对于原料输出国有相当大危害的时候，更是如此。CEPAL把核

>>

心一边陲的架构带进发展理论。第二个思想则是依赖理论，由Theotonio dos Santos、R. M. Marini、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Enzo Faletto等人所开展，延伸CEPAL的核心一边陲架构到政治领域的分析，认为克服依赖体系必须有赖于国际的阶级团结。

而从80年代至今的这段期间，社会学整合了许多不同的全球化理论。一方面有理论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可以消除国家的疆界，让民族国家退位，全世界成为贸易、制度等的一个整体。这个由抽象经济理论而来的观点忽视了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差异。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依赖理论老早就过时了。而另一方面，有后依赖理论认为依赖体系其实是后殖民体系，特别是权力与知识这点上，与传统的富裕与贫穷的概念不同。殖民理论家认识到了我们不可能无视于政治文化的差异而一味地借用欧洲的理论。这个第二期的拉美后殖民理论辨识出了殖民与反殖民之间的历史冲突，并且也认识到了

依赖关系已经被重构 为“殖民性”了

一种全球化的新宰制方式。

拉美的后殖民理论并非将殖民与反殖民视为是西方国家的历史遗产。对他们来说，这些理论的表达方式只是认知和语言学上的策略，也就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和其他人所称的“接触域”，用来认识世界体系中不同的经验与概念。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在全球化镜像中的两个表面上产生作用，中介、翻译南北之间的信息、图像和概念。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全球化包括了在全球论坛和运动中、发表中、以及全球性组织(如ISA或ALAS)等复杂的翻译过程。在这个脉络下，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道德、美学、伦理、语言等的元素得以兴盛茁壮，并且逐渐使得知识转换的模式得以进步。其中的学者如Casanova、Quijano

、Lander，甚至是北方的Immanuel Wallerstein都表示过这个新的殖民主义理论立足点很稳固。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后殖民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前被单一的政治文化历史过程所形塑。我们的确可提出社会学的特别期待：这个区域有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可能。透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拉丁美洲”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象征层次上是不适合的，因为这不过代表了一种语言意义的共同体：

“Latino”，这排除了其他在历史上相当重要的原住民，黑人，欧洲的移民，或是亚洲人。对于拉美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必须是一个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拥有力量去刺激学术知识上的交流，让这个地区内彼此结合得更紧密。■

> 令人失望的 后苏维埃社会学

by Victor Vakhshayn, Moscow Schoo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ciences, 俄罗斯



2008年全苏维埃社会学大会

过去几年来俄罗斯的知识界充满火药味。其中主要有三篇文章引起热烈辩论，其中的两篇是讨论社会学本身，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学的社会学”。这个主题虽然不是学界主流，但却是公众最感兴趣的议题之一。在俄罗斯的社会科学界，研究共产主义的垮台或是转型，已经不再是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基本问题了。既然后共产主义下社会学的

萌芽期已经结束，那么皆下来的就是具有高度反身性的社会学出现了。

> 新苏维埃语言

回顾一下在这个辩论之前的社会学语言，对于我们理解这次辩论是有用的。2008的俄罗斯社会学大会或许是个不错的起点。这场大会具体做出了许多空洞无意义的宣

称，像是“因为社会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提供高质量的社会学研究”，或是“现今的社会学任务是要面对来自社会不论是经济、心理、能量、等其他层面的安全需要”。若我们看一下2500位与会者的问卷数据，有73%在拥有字典的情况下而熟悉一种外语的；40%的人在政府或是类似的商业机构工作；66%会阅读主要期刊Socis；最受欢迎的书籍是由V.

>>

Dobren'kov和A. Kravchenko所编的；而最受欢迎的外国社会学者则是Zygmunt Bauman和Piotr Sztompka。

此外，若被问到社会学的定义为何，最多人的回答是，“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被问到什么是社会，多数人没有回答，而在有回答的之中，最多人说社会是“socium”。如此套套逻辑的答案，其实正反映着这样一种保守的社会工程式语意：社会对国家来说是有用的。若非得需要理论不可，那则必须是俄罗斯的理论，处理这个国家相关的议题。这场大会也不欢迎某些“自由派社会学家”，也就是那些领西方国家薪水、意图煽动橙色革命的学者。总之，这场会议展现了一种稳固的新苏维埃社会学语言正在形成中，这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和分享什么叫做套套逻辑，相当有用。

> 反苏维埃语言

现在让我们看看反面。这里我们一定要提及Russian Pathways这场会议。这是18年来最出色的定期会议。从他出版的刊物(1993-2008)我们会发现他的反苏维埃语言是如何形成和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因此，我们先来看“转型”(transformation)这个字如何从概念演变成隐喻，到最后可以解释任何事情。它就像新苏维埃的语汇一样，有其公理式的宣称，而且不需要任何的理由。首先，反苏维埃语言对于苏维埃社会学和新苏维埃非常批判；再者，它很明白的认为社会学应该为解放、民主、公民社会而服务。另外，其非常强调经验研究，要求以sociography的方式去找出俄罗斯社会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不断重复强调“社会根本问题”的

字眼，其实根本上违背了最基本的实在主义的看法，不把社会当作一个客观的存在，而将许多既定的研究议程加诸在研究者身上。像是伽利略一样预设Book of Nature必须以数学的形式加以写作，反苏维埃学派认为社会应该以社会学--他们自己所认可的社会学--的形式表达。

Russian Pathways的语意在过去15年间并非一成不变。在1990年代的一场辩论俄罗斯未来的事件之后，他们已经失去激进的立场，而此自由派的角度批判政府。虽然表面上的修辞有所改变，然而实际的意义还是一样，从以前的“这不应该是如此”，到90年代的“这不应该还是如此”，一直到“这完全不应该如此”。

> 后苏维埃聚合

正如套套逻辑是新苏维埃的主要精神，悖论则是反苏维埃的底蕴(强调实然和应然的差距)。我要论证的则是，这两者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因为他们都是“苏维埃式”的语汇。

1. 怀疑的文化：两种论述有着同样的预设：“政治利益先于知识。”你所说的并非你实际所想的，而语言则反映出了你的政治立场。所以，任何的理论价值取决于目的是否达成。

2. 实践：新苏维埃社会学认为知识要为国家的利益服务，所以他们以一种社会工程的角度去从事研究；反苏维埃学派虽然不认为学术要为国家服务，但是也要为某种目的而服务，那就是“进步”。在这之中我们看不到所谓的“为了知识而知识”这种东西，或是Weber所谓的为了科学而科学的主张。两者都认为知识要为了某种目标

才得以存在。

3. 理论民族主义：禁止任何外国的理论进口到本国来，除非本来就根植于我们的土壤之中。土壤一词，其实来自于第三届的社会学大会。Russia Pathways则有自己的一套隐喻：“故乡的杨树”。总之，反对外来理论是两者的最大公约数。

4. 没有反身性：不过几年前，保守派和自由派齐声反对方法论的反身性。他们眼中认为这是后现代的偏差，从实在主义的研究纲领中走偏了。而现在两派都在反身性中挣扎打滚，过度的反应反而让俄罗斯社会学停滞不前。

很显然地，上述两者并没有办法涵盖俄罗斯社会学的全貌。其他当然还有，不过其实和主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也不会超出莫斯科Belt-line (像是圣彼得堡)太远。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社会分析、现象学、民族志等方法都在努力争取科学的兴趣时，俄罗斯两派的斗争让社会学沦为是政治的传声筒而已。

> 纽西兰的毛利社会学

by Tracey McIntosh,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纽西兰

纽西兰是一个殖民政府，必须持续不断地面对过去的殖民历史。这意味着，纽西兰的社会学必须处理并响应特权与弱势之间的再生产，因为这就是原住民(毛利人)和非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我作为一个对于毛利人有特别关注与兴趣的社会学者，我相信我们可以借着提出一个整合社会正义的研究纲领，对这个跨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毛利社会学相对而言是少数，不过有越来越多的非原住民投身到毛利社会学的研究之中。

毛利人被剥削、殖民、边缘化的历史，意味着毛利的族群认同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的场域。作为tangata whenua (岛屿主人，原住民)，毛利人及其社会关系向来引起很大争论。在社会负面的各个指标都被过度放大的情况下，毛利人总是必须争辩政治和人民的修辞，这些修辞夸大了他们的因为身为原住民而特有的成就。毛利人的政治斗争也试图去弥补过去(通常是近期的过去)那些土地和资源被剥削的不正义。而成功的经验也代表着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被政治化和放大详细检查。

毛利人和非毛利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研究已经证实毛利人其实同时遭受到双重的不平等对待。毛利新生儿的死亡率高于非毛利人。毛利幼童也比较难取得学前教育资源。毛利学生的辍学率较高，因此学业成就也较低，犯罪率较高。此外，失业率也明显高出其他人，并且收入远低于非毛利人。毛利人也比较容易取得政府的福利补助，多数人住在质量低劣的地方，身心健康条件极差。另外在刑事法律上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不论作为受害者或加害者都高于其他族群，占了全国人口的50% (他们总人口比例不过15%)。有太多太多的毛利人失业、病痛、心理疾病、贫穷、入狱。虽然说他们的地位和合法性从1970年代以来成长了很多，在文化和语言上也逐渐被平等看待，不过相较其他的不平等，毛利人并称不上是成功的。

社会学其实可以在这样的议题上扮演很出色的角色。社会学研究有威力的地方就在于从多元的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下得以发挥。不过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忽略权力的议题。所有的研究都被权利的

动态关系所形塑。从研究过程的一开始，投资、设计、参与、实做，以及推广，权力都是无所不在的。然而，聚焦在社会正义的研究成果将可以凸显研究者和参与者在过程中会遇到的诸多困难与机会。

总之，我想要特别强调以毛利人为中心的跨文化议题。现在，相关的研究都是由毛利人所主导，不过，非毛利人若能跳出传统研究的藩篱，愿意进入毛利文化的脉络中，他们一定可以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至今毛利族群仍未从主流学术研究中获益，因为主流的研究视角有所偏差。现在同样的社群认识到了跨文化研究可以带给他们好处，但仍然宣布毛利研究只对毛利族群有益。受压迫群体必须学习并认识压迫者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以期待可以摆脱自身受压迫的处境与地位。藉由跨族群合作，我们可以教育非原住民群体关于原住民的种种，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教非原住民重新认识他们自己作为压迫者的这个事实。■

> 后苏维埃亚美尼亚的新贫现象

by Gevorg Poghosyan,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Law of the Armen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亚美尼亚社会科学协会会长

随着共产政权的解体，20世纪末的社会转型开启了新的历史扉页。在这个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历经并面临了发展上的困难。所谓的“现代性的反弹”以及去工业化的结果，是这些国家所面对的共同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在这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族群文化的因素排除掉了。

在亚美尼亚，现代性的反弹带来了极度的去工业化，使得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农业，回到古代一般(Poghosyan 2005)。后共产的私有化产生的结果是财富集中在极少数的资本家手中，并制造出一批贫穷且未发展的中产阶级(Poghosyan 2003)。

亚美尼亚现代化转型尚未结束，不过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全国性的调查，我们分析以下的模型(Poghosyan 2005)：

- 上层阶层：政治和经济菁英、大地主、寡头(总

人口5%-7%)。

- 中产阶层：小资产阶级、企业家、高薪专业人员、公职或是管理阶层(10%-12%)

- 大众阶层：办公室人员、服务业、农民、知识从业员、制造商、领取福利补助者，暂时性失业者(65%)。

- 社会底层：游民、失业者、性工作者、社会淘汰者(15%)。

亚美尼亚社会已经分为好几个阶层，根据不同的生活水平而划分。社会人口的边缘化已经开始，这是失业所造成的结果。我这里所谓的新贫阶级，就是那些受到经济转型影响的人，而不是社会文化所带来的结果。很多新贫人口是在共产时期见不到的。

此外，这里的新贫和第三世界的贫穷人口意义也不一样。第三世界指的是因为不识字、不幸意外、高婴儿死亡率、公共卫生

不良所造成的现象。这里的新贫影响到的人拥有高学历和好的保险，是那些过去过得不错的知识阶层、劳工、领取社会福利和家管等。相同的现象现在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也都可以看得到，导因于金融危机。

传统解决第三世界贫穷现象的对策并不适用于解决新贫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概念和方法来处理它，那就是要纳入族群文化的面向。亚美尼亚有自己的经济活动、有一批受过教育的人口和离散(Diaspora)亚美尼亚人投资的能力，因此，出路可能就在中小企业。 ■

References

Poghosyan, G. 2003. *Armenian Society in Transformation*. Yerevan, Armenia: Lusabats [Russian].

_____. 2005. *Current Armenian Society: Peculiarities of Transformation*. Moscow, Academia [Russian].

> 生气蓬勃的 *Current Sociology*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国, 出版副会长(2010-2014)和Eloísa Martín,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Current Sociology主编

早期Current Sociology的研究趋势报告，至今仍广泛被征引。

Current Sociology是一份出版很长一段时间的刊物，今年是60周年，其发展反映了从1950年代开始的全球社会学变迁。ISA成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底下，所以这个期刊也是联合国的刊物之一。Tom Bottomore在1975年担任执行秘书时是主编(1973年的主编Margaret Archer是第一位没有担任ISA行政职的主编)。早期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各国之间社会学的沟通和交流，以近期出版刊物的参考书目为主要内容。那时的社会学还很小，这样的目标尚可达到。那时的标题还有类似“未发展和原始社会的社会学”的字眼，显示出当时联合国行动的优先级，现在则是比较的观点，把世界区分成“工业化”和“未工业化”。

后来刊物的走向很快就



从特定领域的参考文献演变成研究趋势的报导，且都由当时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执笔。这是很有价值的资源。最著名的或许是S. M. Miller在1960年代写的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比较了当时的相关研究，并做出结论。Google Scholar显示它有253笔引用，有几笔还是最近才引用的。

1963年的刊物介绍了研究委员会的成员，那时第一个成立的是家庭社会学。1990年这成为了另外一个独立的类别，称做Current Sociology Monographs。在早期，某几期的主题只限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虽然从题目中我们有时也很难判断是某个国家特有的主题，或是只是某些主题中提到了特定的国家而已。后来某几期则是回顾了特定国家区域的社会学研究，像是Scandinavian Sociology (1977)，和Anglo-Canadian Sociology (1986)等等。到了1997年，成员认为研究趋势介绍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因为

已经有很多其他的刊物可以取代。在Susan McDaniel当主编时，把刊物重新出版，成为了典型的同侪审查的期刊，聚焦在新的研究发展与争辩上；不过同时还是有做研究趋势的回顾，重点在于某个特定的概念、方法、理论等，也处理更大范围的国际议题。

Dennis Smith继续了Susan的先驱性任务，在担任2002-2010年的主编时大刀阔斧将刊物变得焕然一新，更符合学术界的期待。同时也被ISI收录，排名相当前面。此外，由于他可以看出潜藏在文章底下的社会学基本问题，所以他为期刊开创出了一个可以相互辩论的空间。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让作者与批评者在不同的议题上可以分别进行对话。

Current Sociology向来只接受ISA的官方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但由于出版委员会的推动，现在接受任何的语言，只要作者不熟悉上述三种

语言的情况下即可。这提供了机会给那些所谓的边缘国家的研究者可以和全世界的读者发表和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2010年Eloísa Martín接下了主编一职，这是首次由非英语母语的人担任此一职位，也是非核心学术机构学者的头一遭。这反映出了ISA成员组成的变化，代表了更多国家的参与，也为这份期刊带来了新的挑战。

现今全球的大学都面临到同样的情况：出版，否则淘汰(publish or perish)。资源、计划、名声等都取决于学者出版文章的数目，以及出版期刊的排名。尽管在这样的脉络底下，Current Sociology还是要提供比较传统的学术对话平台，交换意见，彼此仔细阅读同侪的作品。透过这样的对话，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以全球性的社会学视野，找出我们各自地方性的实在。■

> 全球化教室

by Larissa Titarenko, Belarus State University, Minsk, Belarus, and Craig B. Littl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Cortland, 美国



Larissa Titarenko教授和创意网络
教学中心工程师Craig Little

新形态的知识社会是以网络通讯科技为基础(ICTs)。虽然网络通讯科技让世界变得更复杂，但也制造出了更多机会。以教育为例，网络科技就让我们可以把书本传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且可以在网络上教学。在公共领域，信息可以透过论坛和社会网络而传递开来，完全不受地理的限制。

虚拟教室的学生虽然说在物理空间上是分处各地，但是象征意义上他们是连结在一起的，一起参与活动、学习、并讨论。和传统的教室不同，网络教室让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进出教室，彼此还是感觉一起在上课，一起分享。

> 在线共同学习

以往网络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当传统的一如何找数据、使用数据、或是有效率的使用。不过，透过远距教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学生们可以更容易的参与学习，而不

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远距教学让来自不同国家、城市、乡镇等的学生可以一起学习，就好像是一同进到一间教室里面上课一样。所以，虚拟教室虽然是肉眼看不见的，但却是相当真实。学生透过彼此一起讨论、辩论、联络等等，可以一起建立连带感，彼此相互打气。

在传统教室和虚拟教室中，两者都是由老师和学生一起建构知识。在虚拟教室中，学生感觉就像是镶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并透过表达意见、知识交换，知识变成个体的，甚至是互为主体。他们不只从书本上习得知识，还从与人互动中获取知识。也因为他们不是近距离的看到老师，他们更加独立，更能自在地表达自我。

因此，网络科技的优点之一就是若当我们把它应用在高等教育中，我们可以建构一个由全球各地教授和学生一起形成的学习分工与环境。虚拟教室可以让不同国家、不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透过沟通而一起学习。虚拟教室鼓励学生参与对话讨论。他们也要做作业(通常是要求彼此检查作业)，并且透过学习管理系统(LMS)上传。在线教学的形式，学生的负担其实不轻，不过透过自由、自主的学习方式，可以刺激学生的动机和兴趣。对于老师来说，让学生可以与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切磋，是一个非常棒的回馈。在线对话是典型的作业之一，但恐怕也是最有趣的。因为学生在这个意义上是全球知识公民的一员。

我们有10年远距教学的经验，总共举办过6次，得到的回馈非常正面，远远超出我们在纽约州立大学(SUNY Cortland)传统教室的经验。我们虚拟教室的两位老师：Craig Little教授(美国)和Larissa Titarenko教授(白俄罗斯)，他们在2001年于保加利亚的联合大学民主会议(AUDEM)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对于在会议中展现的网络科技感到印象深刻。于是马上就

决定展开合作，举办远距教学，以加大我们学校社会学学生的视野，特别是在跨文化沟通和比较方法上。每次上课有18-25人，多数是社会学学生。参与的大学主要有3所，包括Moscow State University (Dr. Mira Bergelson) 和来自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 澳洲) 的学生，Craig Little教授则参与过早期的教学。¹

> 学习成为全球公民

因此，当我们提到虚拟教室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包括来自两到三个国家以上的师生所组成。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由美国、白俄罗斯、澳洲、俄罗斯。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其母语是英文。最有挑战性的是来自白俄罗斯的。他们要面临的挑战来自于下列三者：用英文上课，用不熟悉的网络科技，以及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方式。他们也通常没有出过国，所以，例如要学习某个国家的青少年文化，那是完全陌生的。不过，美国和澳洲学生也通常没到过共产主义的国家(倒是很多人到过欧洲)，所以他们也能从中收获不少。

虚拟教室和远距教学上学生透过特定的教材、在线的课程、以及作业而进行学习。学生带领的讨论课由学生问问题，讨论正在全世界发生中的大事，透过这样他们学习到外国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

我们进行这样的教学模式已经好几次了，经验都很成功。学期末学生都肯定自己学到了很多，特别是透过在线以及个人的联络管道，让他们交流很频繁。从他们的教学评鉴反应中可以知道，他们很满意可以得到其他国家的第一手消息，也可以自由地问问题，而且在课程结束后不会感到压力，例如时间的、老师的、或是疏于讨论所导致的压力。²

> 激发学生

我们的教育哲学是来自Dewey的以学习者为主体的理念。我们鼓励学生去讨论很多实际案例，像是地方的法律执行、犯罪案件、刑罚、权利侵犯等等。通常他们也都讨论“假如”的假设性问题，去理解为什么在某个国家会使用某种方式。目的不在于要他们找出最好的办法，而是要透过讨论，去比较各种方式的异同。举例而言，他们会学习到俄国、美国、澳洲、瑞典的刑罚，透过统计资料去看他们的累犯率等；此外也学习到三种历史的社会控制模式：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每个学生都要求读完三本教科书，定期写作业，参与课程，带领讨论。整个平台原

本是SUNY的“学习网络”所提供，现在则是SUNY Cortland的在线学习管理系统。

我们相信对所有学生来说，这是个很特别的经验，而且对白俄罗斯的学生而言可能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他们在经济与政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又只有很有限的英语学习资源，能够有机会可以参与西方的课程，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真的很难得。我们由衷相信我们可以跨越核心和边陲之间的鸿沟，鼓励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讨论和学习知识。以东西差异的二分法来看，我们也希望学生可以超越这种刻板印象。我们虽然用西方的教科书，但是也会用白俄罗斯的教材和其他国家的资源。学生可以从地方和理论去提出论证。在这个意义上，学生透过网络和合作去学习人权与民主。

总之，我们的在线学习与虚拟教室的经验让我们发觉网络通讯科技在教育上的无穷潜力，对于那些在国际间被政治孤立的国家特别是如此。这是一个学习知识的管道，也是累积人力资本的好方式。■

1 请见Craig B. Little, Larissa Titarenko and Mira Bergelson (2005), "Creating a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Distance Learning Classroom." *Teaching Sociology* 33(4): 355-370.

2 关于网络远距教学的有用资源，请见 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COIL) 网站: <http://coil-center.purchase.edu>. 若有进一步的问题请联络 Craig Little: Craig.Little@cortland.edu

> 国家学会的不平等待遇

我们要改变

ISA選舉制度

by Roberto Cipriani, University Roma Tre, 意大利, 欧洲社会学会于ISA国家学会的代表会长

2002年在Brisbane的ISA世界大会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那就是决定选出国家学会副主席。但是程序规则却有些急就章，因为那时候想做的就是赶快产生这样一个职位而已。当初并没有把选举订在下一届于Durban的大会，反而是马上选出印度籍的Sujata Patel为第一任副会长(接下来2006则是在Durban选出代表美国的英国籍Michael Burawoy和2010于Gothenburg选出的南非籍Tina Uys)，这些社会学家表现都相当称职且杰出。

这些选举是奠基在一个较为广大选举人的基础上产生的，那就是Assembly of Councils其包括了由国家学会代表所组成的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CNA)以及由研究委员会所组成的Research Council (RC)。两者的人数一样多，都是55位选举代表。不过到了后来真正进行投票时，后者的人数变多了，因此有点失衡。所以我们以下将各界的组成人数列出：2010 Gothenburg (43CNA + 47RC)；2006 Durban (35CNA + 45RC)；2002 Brisbane (30CNA + 44RC)；1998 Montreal (38CNA + 41RC)；1994 Bielefeld (43CNA + 46RC)。由此可见，研究委员会拥有决定性的多数可以选出国家学会副会长，反

而是国家学会的在选举上是比较不利的。

再者，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两次世界大会的间隔中，我们会换掉副会长至少一次以上，可是研究委员会副会长的任期相对稳定，因为是4年。这让研究委员会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熟悉彼此，进行交流，增强连带，促进合作。同时，国家学会却会变动，定期会议的参与成员和世界大会选举时的成员居然是两批不一样的人。

因为上述诸多原因，选出的国家学会副会长会即使是用来代表国家学会，不过也受到研究委员会的支持。所以结果就是这个职位实际上不只代表国家学会，也代表研究委员会的支持。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让国家学会会员参与国家学会副会长的选举，让研究委员会排除在此选举之外。国际社会学会向来一贯就是让所有代表可以选出会长和其他三位副会长(财物、出版、计划)，那么改变国家学会和研究委员会的副会长选举制度是特别有用的。■

> 介绍日本编辑团队

在此我们介绍充满活力日本全球对话编辑团队。

我们日本团队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向全世界的读者作自我介绍。在此我们想要谢谢Michael Burawoy以及其他的编辑们，谢谢你们跟大家分享宝贵的经验与看法。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2014年于横滨举办的世界大会，以及我们如何重新复苏日本。



芝真里 (Editor in Chief) 是Boston University的教育硕士，并在Boston有教育多元背景小孩的经验。她现在是名古屋大学的博士生，同时也是RC31 (迁移社会学)的会员。研究兴趣主要是美国和瑞典的国际收养现象。



岩馆豊是东京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生。他开始从事田野调查，企图去研究年轻劳工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如何在日常生活里去建构社会空间。



西原和久(Editorial Supervisor)是名古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也是日本社会理论学会的会长，专长是社会学理论，特别是以现象学方法研究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现在主要研究东亚的迁移现象，特别是日本的外国农民。



三部倫子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外语系，现在是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她也是这里的社会科学硕士。她研究日本的性少数和其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福田雄是关西学院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生，专长是宗教社会学和集体记忆。他已经开始田野研究，去了解灾难后的仪式，像是原子弹爆炸和地震发生后的纪念活动。



佐藤崇子从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的国际和平和西班牙语文系毕业，现在是北海道大学的博士生。她的研究是美国移民政策，以及非法移民的社会网络。



姬野宏辅是东京大学的博士生，专长乡村社会学，从事田野去保存在名古屋县的小农村和文化。他很荣幸可以担任全球对话的翻译与编辑工作。



塩谷芳也是东北大学的博士生，专长为社会阶层与不平等。最近他刚完成一份日本关东大地震的调查，分析受灾者收到社会的援助以及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池田和弘已经于2005年完成东京大学的博士修业课程现在是东京上智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是国际研究计划“比较气候变迁的政治网络”(COMPON)一员，也是RC24 (环境与社会)的成员。



高见具広是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也是日本促进科学学会的研究员。研究兴趣是工人的自主性，特别是长工时的相关议题。

> John Rex过世，享年86岁

by Sally Tomlinson,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and Robert Moor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英国



John Rex：社会理论和种族关系的先驱。

John Rex在2011年12月18日过世了。他的热情、活力、智识，将社会学带上新的颠峰，让人们很难忘记。John Rex在南非的Port Elizabeth出生，18岁时在二战期间于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战后回到南非，目睹种族隔离的不公不义，所以在他转念社会学和哲学之前，他是主修神学的。他在Rhodesia的一所学校教书，直到后来被驱逐出境——因为他支持反种族隔离运动。后来John Rex在Leeds University拿到博士，并在该校教书。1962年，他转到Birmingham University，接着1964到Durham University、1970到Warwick University。他是这两间学校社会系的创始者。1979-1984年，他在Aston University担

任社会学研究与种族关系中心的主任。除了到Toronto、Cape Town、New York等大学客座访问之外，其余时间他都在Warwick University教书，直到退休。晚年则病痛缠身。

John对社会学有极大热情，后来出版了*Key Problem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1964)，让读者可以超出Parsons的视野，多接近古典社会学的作品。他的思考围绕在Marx、Durkheim、Simmel、特别是Max Weber上。他重新唤起了大家对于冲突理论的兴趣，认为价值和利益的冲突是一种社会规范，其1981年出版了著作*Social Conflict*。John也对权力的社会运作理解得很透彻，且曾经有机会成为工党的国会议员，不过他认为分析政治与社会才是学者的工作，从政并非选项。

他对科学的热情丝毫不影响他对种族主义的厌恶，特别是1950年代针对刚到英国的第一代移民的种族主义。他也是UNESCO的种族与正义的国际专家委员会的委员。1967发表了一个声明，清楚指出“所为的种族问题是社会所造成的，而非生物性的。”，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看法！他在ISA的种族关系委员会担任了8年的会长。1964他和Robert Moore在Sparkbrook (Birmingham)展开研究，后来

发表了最著名的著作*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Rex and Moore, 1967)，后来1974回到Handsworth, Birmingham又出版了另一本书：*Colonial Immigrants in a British City: a Class Analysis* (Rex and Tomlinson, 1979)。

John Rex对于他的论证非常坚定且不轻易妥协，因此他触怒了几个与其一件相左的同事，而且他也喜欢挑战那些他觉得肤浅的看法。不过，他的看法始终受到尊敬。他过世后，来自他以前学生和同事的吊唁非常多，都说“他改变了我”。其桃李满天下，遍及世界各地。生前他最后的著作是一篇论及1970年代Birmingham的社会学教授Wilhelm Baldamus的文章，他这么说“Baldamus是个特别的人，不攀附在主流的学界思想；他在面对同事和朋友的时候也仍然是坚持己见，不会逢迎附和。”这段话其实也可以用来描述他自己。2010年他从英国社会学会得到了终身成就奖。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忘了他的。■

> 追思Kurt Jonassohn 1920-2011

by Céline Saint-Pierre, University of Quebec in Montreal, ISA 执行秘书, (1974-1979), ISA 执行委员(1986-1990)



Kurt Jonassohn：坚定的ISA贡献者。

1974年，我和Kurt Jonassohn同时被选为ISA的执行秘书，Tom Bottomore是当时的会长。秘书处当时要从Milan移到University of Quebec in Montreal (UQAM)，也就是我任教地方。Kurt是University of Concordia的教授。后来我们共事合作了五年之久(1974-1979)，后来他和Marcel Rafie继续担任秘书一职。Rafie也是UQAM的社会学教授。最后秘书处移到Amsterdam (1983)才结束。

Kurt虽然在加拿大Montreal的英语学术社群有很好的职位，不过他也说了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平常的工作交谈都用法语进行，而且是他坚持要这么做的。他对Quebec的法语

文化非常敏锐与熟悉，让我好生敬佩。也因此，他对于当时以英语为主流的ISA中法语地位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影响。

我们两人都对财务等事物不感兴趣，然而Kurt后来很慷慨地接受了财务主管一职。当时ISA的财务状况并不佳，所以这很不容易。收入来自个人和团体会员，可是还是不够，1974年在Toronto的世界大会还是赤字的。Kurt小心谨慎地和执行委员会处理这些事情。而到了我们第一任结束时，财务却反亏为营。总之，不论财务状况为何，Kurt始终如一，诚实地承担起这个重责大任。

Kurt Jonassohn也在对于ISA的历史认识上，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藉由19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期刊，并访问了ISA之前的会长，成为了1998年Jennifer Platt出版的A Brief History of the ISA: 1948-1997一书的主要材料。

在卸任之后，他还是和ISA一起合作共事了好几年。同时他也继续教书和研究。其生涯最高峰的著作是与Frank Chalk共同创立的Montreal Institute for Genocide Studies (1986)。Kurt Jonassohn于1920年8月31日生于德国Cologne，于2011年12月1日过世于Montreal。■

> 哥伦比亚社会学的承袭与断裂

by Patricia S. Jaramillo Guerra with Fernando Cubid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 at Bogota



社会学是玩真的！年轻的哥伦比亚社会学者参加Cali于2011年11月2-4日的全国会议。

2011年11月2-4日，在哥伦比亚的Cali举办了哥伦比亚的全国社会学会议，主题社会学的承袭与断裂。主办方是由Universidad del Valle，Universidad ICESI，和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的社会系所负责。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议开始之前的暖场会议是聚焦在Weber

的思想。

这次会议的成功对于我们社会学的巩固相当重要，因为上一次举办大会是在2006年。虽然说哥伦比亚社会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不过由于社会学宣称与游击队有关系，在这个被视为暴

力的脉络下，许多社会系被关掉了，直到最近的5-10年，才有社会系陆续重新成立。

从内容来看，哥伦比亚的社会学是由社会的许多冲突矛盾所形塑而成。例如暴力与民主的共存，拉美最严重的不平等，同时又拥有拉美其他国家所罕见的法制化的社会与文化权利。哥伦比亚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环境，相对的，社会学也被要求负起更多的责任。

Weber会前会议是由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社会系和其他主办本届会议的社会系所筹划的，目的是要讨论Weber思想在最近的转变，邀请到许多知名的学者，包括Wolfgang Schluchter (德国)，Francisco Gil Villegas (墨西哥)，Esteban Vernik (阿根廷)，Javier Rodríguez Martínez和José Almaraz Pestana (西班牙)。与会者都强调了不论是学者或是公众，重新阅读Weber都有其重要性在。国内和国际的学者都提到如此阅读古典作品是很少见的，所以也充分反映了哥伦比亚社会学的现状。

我们邀请到了很多知名的学者，如ISA President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拉美社会学会(ALAS)会长Henrique Martins (Federal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 巴西)，Alejandro Portes (Princeton University的移民与发展中心主任，美国)，Emilio Tenti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Santiago, 智利)，Milton Vidal (University Academy of Christian Humanism, 智利)。他们都是在当代不论全球社会学、公共社会学、移民、后殖民研究辩论中很知名的人物。

会议算是空前的成功。24个工作场次，600名与会者，200篇文章，11位国际贵宾，以及从Colombian Network of Sociology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RECFADES)来的15个社会学相关单位。大会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和大会的闭幕主题相互辉映：“社会学很蓬勃”和“社会学就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有正当性”。

工作场次的气氛也显示了哥伦比亚社会学的生气勃勃，由有越来越多的师生反对全球贸易这点可以清楚看到。另一个值得提的是许多的社会系毕业生都到其他领域做出贡献；我们也看到这个学科充满多元性，像是新的主体概念和非传统研究性别的方法，以及新的方法研究各种主题。过去不怎么受欢迎的主题如今也热门起来，特别是从品味、风格、艺术表达的观点去看待消费。此外当然也有传统的社会学题目：暴力、农民运动、劳工组织、农村小区等，这些领域还是相当活跃。

会议受到热情的掌声，我想不单单是筹办者的用心与高超的技术让这场学术会议如此成功，还因为他们展现了墨西哥城市所特有的慷慨、好客与热情。 ■

> 欧亚的土耳其社会学

by Elena Zdravomyslova, European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 俄罗斯, ISA执委(2010-2014)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首都Ufa
举办了第四届土耳其社会学大会

2011年9月4-6日，从俄罗斯、欧洲国家、土耳其、哈萨克、亚塞拜然、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国而来的知名社会学者到Ufa参加土耳其社会学世界大会。主题是：“欧亚空间：21世纪俄罗斯地区和土耳其语国家的文明化潜力”。上一届是在2005年由土耳其举办，后来陆续于哈萨克和吉尔吉斯

办了多次会议。

Ufa是位于南Urals的一个美丽宜人的城市，人口有上百万人。它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个位于俄罗斯联邦自治区的国家——的首都。另外它也是多族群的地区，其中巴什科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族群。巴什科语属于土耳其语系，其宪法规定了俄罗斯与巴什科语

>>

为官方语言。然而，说巴什科语的人很少，即使最近政治上越来越想推动这个语言，不过还是快要销声匿迹了。

俄罗斯的社会学者会彼此相互沟通交流。这次巴什科社会学会(也是俄罗斯社会学会的集体会员之一)举办了这场有超过200人参加的大会。政府很支持这次活动，并提供财务与组织上的资源。总统发言人负责开幕演讲。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场合由以下的一些单位负责：Bashkir Academy of Sciences会长、土耳其社会学元老副会长、俄罗斯社会学发言人、亚塞拜然的副会长，以及ISA的代表：我。俄罗斯语和土耳其语是会议中最普遍的交谈语言，现场也提供同步翻译。

论文聚焦在欧亚，包括欧亚的空间、文明、历史、共同面对的问题，以及未来展望。由土耳其社会元老组织的社会学家Erkal Mustafa认为，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去概念化世界上各种分化的现象，以支持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主题演讲题目是关于欧亚文明化的多重认同，这是由俄罗斯的社会学家L. Gumilev所提出的。他们把焦点放在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土耳其典范上，还有跨国认同的强化以及土耳其世界的全球整合。

论文主要围绕在欧亚主义和土耳其与俄罗斯世界中社会问题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四个场次分别是：“欧亚主义：科学研究的问题与前景”，“当代欧亚的社会动态：问题与解答”，“欧亚空间的文化面向”，“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社会学”。此外一个重大的进展是将要发行*The Eurasian Sociological Journal*。

另外这些国家也采取了很多合作行动，像是建立跨区域和跨国链接、大学之

间师生的交换，增加共同研究和翻译计划的合作机会等等，这些都可以把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串起来。此外，会议的另一个重点是增加巴什科社会学会的重要性。巴什科社会学会将在2012年10月举办全俄罗斯地区的社会学大会。

会员大会中也起草和通过了许多提案，像是促进土耳其语国家的社会学合作，促进俄罗斯和土耳其社会学家的交流，土耳其代表和Ufa大学同意彼此交换师生。而在宴会时社会学家彼此交换礼物也象征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文化连带。

大会为巴什科社会学会的创始者Nariman Aitov (1925-1999)制作了纪念牌。他是第一代的苏联社会学家，1964在Ufa成立的社会学实验室。他在区域规划、社会工程、社会流动、以及科技革命的社会影响等领域有着很大的贡献。此外他著作等身，发表过300篇文章或书籍。2000年Academy of Sciences of Bashkortostan设立了Aitov Award，奖励杰出发表著作。

总之，此次会议代表的是土耳其语国家的社会学者之间文化与学术的密切交流合作，正式跨国之间的社会学多元性格。不令人意外的是土耳其来的社会学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就是个独立的地域了。北北高加索和俄罗斯东部还有为数不少的人说土耳其语。然而整合所需要的不只是语言的相似性，而还需要有共同的中亚共同文明的理念。因此，历史根源、现代化路径、集体记忆、文化传统等都是社会整合所需要的智识资源。如同其中一位大会组织者所言：虽然土耳其语的国家已经彼此分家了数千年了，不过现在还是可以在学术和文化上携手合作。■

> 印度社会学的60周年大会

by T. K. Oommen,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New Delhi, 印度, 印度社会学会组织委员会会长, 前ISA会长 (1990-1994)



60周年大会于2011年12月11-13日，在New Delhi的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JNU)举行，由社会系统研究中心(CSSS)主办。此中心是JNU里面一个很杰出的社会学单位。本会议的组织秘书长Anand Kumar就是CSSS的教授。

印度社会学会(ISS)每年举办会议，每次的会议结构有三的组成部分：全体

出席场次(开幕、闭幕、两个纪念演讲)，工作坊以平行的方式进行，24个研究委员会(RCs)分别会有会议。会前会和会后会的场次则在不同的成是举办。近几年年轻社会学家的会议也会安排在会前举办。会前会议和会后会议也都很重要，这次在Bombay和Lucknow举办，这两个地方都是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重镇。

T. K. Oommen教授因为担任过印度社会学会会长而受到副总统Shri M. Hamid Ansari的表扬。副大臣Sudhir Kumar Sopory站在中间，ISS会长Jacob John Kattakayam则在右边观看。

这次开幕由学者出身的印度副总统Hamid Ansari做开幕致词，认为社会学在解决当代我们所正面临的危机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脉络下其实正突显出了公共社会学的意义。ISS的会长J. J. Kattakayam则以这次会议主题“社会学和印度社会转型”演讲。

开幕场次颁发杰出荣誉给杰出的印度社会学家。总共3人：S. K. Srivastava (Benares Hindu University), P. K. B Nayar (Kerala University), J. P. S. Uberoi (Delhi University)，他们都得到终身成就奖。以印度尊敬长者的传统为基础，所有的前ISS会长都会受颁此一荣誉。

5个工作坊的主题分别是：“社会学和社会转型的危机—全球观点”，“治理危机”，“极端主义的危机”，“发展危机和边缘化”，“Delhi的社会和社会学”。第一个工作坊是全球性的，最后一个有在地意义，其他三个则以印度为主，如此和盖了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次。我不会对这些场次做评

价，但我会用报导的方式介绍它们给国际读者认识。而另外有来自国外的4位讲者，分别来自美国、瑞典、德国、日本。Michael Burawoy的这场我是主持人，他强调以社会运动去了解现在社会变迁的重要性，既是是病征，也同时是解药。我则强调社会学和社会转型危机两者不可分割的角色。其三3位则主要谈他们国家的问题。

为了反映印度社会学的多元性，两场纪念演讲主题分别是“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概念与方法的重构”(the M. N. Srinivas memorial lecture)，由P. N. Mukherjee教授担纲讲者；

“从理念型到隐喻—重新检视革命的概念”(the Radhakamal Mukerjee memorial lecture)，讲者是D. N. Dhanagare教授。他们俩会都是ISS的前会长。相对年轻的Dipankar Gupta教授则是负责闭幕演讲，题目是：“进行治理：公民、成长、发展”。

论文摘要手册总共收录了775则摘要，来自22个研究委员会。其中最大宗是

由两个委员会来的：“乡村、农民、部落社会”和“社会”变迁和发展”。最少数的来自“教育、社会、理论”和“概念与方法”研究委员会。这或许反映了印度社会学的走向。

此外，ISS的期刊*Sociological Bulletin*发行了特刊，收录两篇大型的研究论文。第一是A. M. Shah教授等人所写的关于ISS历史的论文，以及另外由主编N. Jayaram所写关于*Sociological Bulletin*五十年历史的论文。另外，Sage Publishers出版了7册*Sociological Bulletin*的论文集，其中6册分别处理不同主题：印度社会学、变迁中的卡斯特、农业变迁、以及关于边缘族群、教育、社会运动的主题。第7册则节选了过去的会长演讲。

这次大会总共1500人参与。这篇简短的描述或许可以给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比较的基准。最重要的是要让印度社会学家知道印度社会学已经走过了多少的岁月。■

> 金砖四国的社会阶层

by Tom Dwyer, University of Campinas巴西, ISA执委(2010-2014)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北京齐聚一堂讨论各国的社会阶层化议题。

32

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因为改变了全球秩序地景，所以很快地受到瞩目。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过程和各国内部的社会阶层，2011年的10月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讨论李培林新编的书：“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此书试着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素让这些国家整合与分离。

一开始称呼这些国家为金砖四国的原因是它们土地大(超过3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超过1.5亿)，以及拥有高成长率的发展经济。这些论文不但让我们了解这三个因素在经验可检证的层次上对于经济政治的影响，还增进我们的知识。于这四国明显地都存在地域的不平等很。因此，透过比较这些发展国家，找到相对多数的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不平等远大于都市，以及公职人员和政治人物所拥有的财富资源不成比例地高而也形成所谓新的中产阶级。当我们检视这本书许多细节时会发现某些共同的社会动态：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取得教育资源，但是很多结构性的不平等依旧存在。此外，这四个国家的经济成

长没有一个是因现代化而产生的，因此，这告诉了我们这里有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意涵存在。

上述诸多的相似处带来了相同的反应，也认识到主流欧美社会阶层理论在实际应用于四国经验时的落差。我们之所以质疑传统社会阶层化理论的观点在此的适用性，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高度的社会流动，以及专业生活概念的结束。我们也说明了能动性概念的缺乏使得我们很难去解释认同形塑和社会变迁。所以，为了要让四国的比较更有意义，我们认为有必要去更进一步认识国家的统计资料，看看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是如何不同。

当我们在辨识金砖四国的差异时，我们可以知道，差异以及差异所导致对社会政治行动的结果，会因为四国彼此了解更多，而变得更清楚。了解差异，以及发展出共处的能力，我相信是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关键，也帮助我们去管理那些看似不可避免得社会冲突。这里也正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之处。■